资产定价

杨弘毅

创建: 2021 年 6 月 10 日 修改: 2022 年 1 月 2 日

目录

1	TOI	1	
2	基础		
	2.1	CAPM 与 APT	2
	2.2	APT 推导	3
	2.3	异象	5
	2.4	因子	6
	2.5	系统性风险	8
3	方法论		8
	2.1	Fama MacRath 回归	0

1 TODO

• campbell-shiller 分解

2 基础

2.1 CAPM 与 APT

资本资产定价模型(Capital Asset Pricing Model, CAPM)的诞生,才首次清晰的描绘出风险与收益率之间的关系。根据 CAPM 模型,资产的预期超额收益率由如下一元线性方程决定:

$$\mathbb{E}[R_i] - R_f = \beta_i \left(\mathbb{E}[R_M] - R_f \right)$$

其中 R_i 为某资产 i 的收益率, R_f 为无风险收益率, $\mathbb{E}[R_M]$ 为市场组合的预期收益率, $\mathbb{E}[R_m]$ — R_f 为市场风险溢价(Market risk premium),也称为市场因子。其中有 $\beta_i = \frac{\text{Cov}(R_i, R_M)}{\text{Var}(R_M)}$, β 刻画了该资产 i 收益对于市场收益的敏感程度,也被称为资产 i 对市场风险的暴露程度。

随后 Ross (1976) 提出了著名的套利定价理论 (Arbitrage Pricing Theory, APT), 为多元线性模型:

$$\mathbb{E}[R_i^e] = oldsymbol{eta_i'} oldsymbol{\lambda}$$

同 CAPM 模型相同, $\boldsymbol{\beta}$ 为因子暴露(Factor exposure)或称为因子载荷(Factor loading), $\boldsymbol{\lambda}$ 是因子预期收益率(Factor expected return),或称为因子溢价(Factor risk premium)或因子风险溢酬。由此可见,资产 i 的预期超额收益率 $\mathbb{E}[R_i^e]$,为等式右侧一系列因子的预期收益率,以及该资产在这些因子上的暴露决定。同时可以发现,此时研究的是不同资产之间的预期超额收益率的差别,称为(横)截面(Cross-sectional)差异,而非时间序列(Time-series)或时序上的差异。因此,给定因子预期收益率,不同资产预期超额收益率的差别,由其在这些因子上的暴露决定。那么多因子模型研究的核心问题,是找到一组能够解释股票预期收益率界面差异的因子。

有几点需要注意,在这里使用 $\mathbb{E}[R_i^e]$ 为代表资产的预期超额收益率,而非如 CAPM 中表示的 $\mathbb{E}[R_i] - R_f$,是因为在实证中,经常采用多空对冲建立投资组合,此时便无需再减去无风险收益率。 另外,学界研究的对象始终为资产的预期草娥收益,因此有时将"超额"二字省略。

2.2 APT 推导 2 基础

2.2 APT 推导

第一步,假设资产的收益率,在单因子情形下,满足如下线性模型:

$$R_i = \mu_i + \beta_i f + \varepsilon_i$$
, $i = 1, \dots, n$

此时 R_i 为资产收益率, μ_i 资产 i 的预期收益率, β_i 是资产在因子上的暴露,而 f 是因子取值,而非因子风险溢酬, ε_i 为资产 i 收益率的随机扰动或特质性收益率,并满足 $\mathbb{E}[f] = \mathbb{E}[\varepsilon_i] = 0$,若改写为向量形式,为 Ross 在 APT 中使用的收益率模型,有:

$$R = \mu + f\beta + \varepsilon$$

第二步,构建一个 arbitrage portfolio,这个投资组合中资产的权重 ω 满足如下两点特性。首先,该投资组合是零额投资的,即:

$$w'1 = 0$$

其中有 1 为全为 1 的向量。其次,并且 $w'\beta = 0$,即该投资组合在该因子上的暴露为零。此时这个投资组合的收益率应为:

$$R_p = w'R = w'\mu + w'\beta f + w'\varepsilon$$

由上可知,这个投资组合的收益率可化简为:

$$R_p = \mathbf{w'}\mathbf{R} = \mathbf{w'}\boldsymbol{\mu}$$

第三步,运用无套利约束,可知根据 w 构建的投资组合有如下性质:零额投资;对因子的暴露为零(因此该组合没有系统性风险);没有特质性风险暴露(因为组合中特质性收益率为零)。换言之,这样一个投资组合,既没有资金投入又没有风险暴露,因此根据无套利约束条件,它的收益率必须为零,即:

$$R_p = \boldsymbol{w'}\boldsymbol{\mu} = 0$$

根据几何可知, $w'1 = w'\beta = w'\mu = 0$, 说明 w' 与 1, β 和 μ , 都相互垂直。因此 μ 必然在

2.2 APT 推导 2 基础

1 和 β 构成的平面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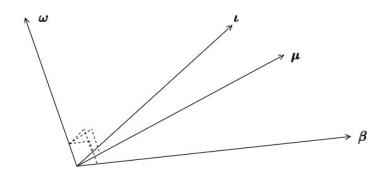


图 1: APT

因此在数学上,资产预期收益率 μ 可以写成 1 与 β 的线性组合,即:

$$\mu = \gamma_1 \mathbf{1} + \gamma_2 \boldsymbol{\beta}$$

那么此时上式应对任何资产都成立,为了求解 γ_1 与 γ_2 可代入特殊资产,无风险资产(R_f),与市场组合 (R_M) 。由于无风险资产的因子暴露为零,代入上式可得:

$$R_f = \gamma_1$$

对于市场组合,其 beta=1,并将 $\gamma_1=R_f$ 代入,可得:

$$R_M = R_f + \gamma_2 \times \mathbf{1}$$

因此有:

$$\gamma = R_M - R_f$$

代入原式,最终可得到 CAPM 的表达式:

$$\mu_i = R_f + \beta_i (R_M - R_f)$$

在此基础上,扩展至多因子,即得到 APT 模型:

$$\mathbb{E}[R_i^e] = \mu_i - R_f = \beta_{i,1}\lambda_1 + \beta_{i,2}\lambda_2 + \dots + \beta_{i,K}\lambda_K$$

2.3 异象

而在实际过程中,等式两侧并不相等,而存在着定价误差 α_i (Pricing error):

$$\mathbb{E}[R_i^e] = \alpha_i + \boldsymbol{\beta}_i' \boldsymbol{\lambda}$$

定价误差有可能由两方面产生:

- 模型设定偏误,即等式右侧遗漏了重要的因子,当被遗漏因子加入后,可消除 定价误差
- 模型设定没有问题,但由于资产收益的实际数据只是总体的一个样本,那么误差总是存在的,此时需要通过统计的方法检验误差 α_i 是否显著不为零:
 - 若 α_i 并非显著偏离于零,则出现只是样本问题
 - 若 α_i **显著偏离零**,则说明了可以通过套利而获得超额收益的机会,市场对该资产出现错误定价(Mispricing),从而导致了实际预期收益率与多因子模型下的预期收益率出现偏离

假使我们根据基本面特征或量价指标等特征,挑选出一揽子股票并构建<u>多空投资组合</u>。若该组合的收益率无法被多因子模型(如 3 因子、4 因子、5 因子模型)解释,则称该特征为一个**异象** (Anomaly)。即该特征获得了多因子模型无法解释 *alpha* 收益率,但从有效市场假说出发,市场中不应该存在很多异象。同时在学界不断的挖掘中,获得了 400+ 个异象,且在样本内都获得了很高的 t-statistics,这里可能存在两个原因:

- 数据挖掘,大量的异象在样本内被挖掘出,因此 Harvey, Liu 和 Zhu (2016)提出异象收益率的 t-statistic 至少要超过 3.0,而非传统的 5%显著性对应的 2.0,才可能真正有效,而非来源于运气
- 模型相关,若以 CAPM 为定价模型,那么许多异象都能获得 CAPM 无法解释的 α 收益率,同时随着定价模型中因子个数的增加,更多的异象变得不再显著,而真正的定价模型是未知的

Hou, Xue 和 Zhang(2017)长达 146 页对异象的研究中,复现了学术界提出的 447 个异象,涵盖动量(57 个)、价值/成长(68 个)、投资(38 个)、盈利(79 个)、无形资产(103 个)、以及交易摩擦(102 个)六大类。对于这 447 个异象,在排除了微小市值股票的影响后,其中 286 个(64%),在 5% 的显著性水平下不再显著(下同)。若按照 Harvey,Liu 和 Zhu(2016)的建议把 t-statistic 的阈值提升到 3.0,其中 380 个(85%)异象不再显著。最后,如果使用 Hou,Xue 和 Zhang(2015)提出的 4 因子模型作为定价模型,那么其中 436 个(98%)异象不再显著,仅有 11 个异象显著。

对于超额收益,学术界和业界主流的两种解释是错误定价和风险补偿,错误定价意味着投资者可以通过合理的策略获得潜在的超额收益;而风险补偿则意味着投资者获得的收益是以承担额外风险为代价的。

2.4 因子

异象有可能能成为优秀的因子,但不是所有异象都是因子。因为作为一个因子(Factor),需要能够解释资产(个股或投资组合)预期收益率截面上的差异,并有增量贡献。具体而言:

- 异象从方程的左侧,移动到右侧称为一个因子,称为解释变量,需要考察期是 否能解释预期收益率截面上的差异
- 由于多个异象之间并不完全独立,需要排除相关性的影响,考察是否有增量贡献

如价值因子,也可以采用 E/P 或 B/P 构建 High-Minus-Low 组合,若同时使用,两者相关性必然很高,因此若使用其一作为价值因子,另一因子对资产预期收益率截面差异的解释能力的增量贡献将变得很低,无法称为因子。

对于因子模型接下去的问题就是,在构建多因子模型时:选取因子因子的数目;以及选取哪些因子。第一个问题,因遵循简约法则(The Law of Parsimony),或奥卡姆剃刀(Occam's razor)。若从 ICAPM(Intertemporal CAPM)的角度理解多因子模型,每个因子应代表某种状态变量(State variable),即为投资者想要对冲的某种风险。因此,因子的个数应该是有限的。目前主流的多因子模型如下:

• Fama-French 三因子模型 (Fama and French 1993): 多因子模型的开山鼻祖,包括 MKT、HML 以及 SMB 三因子。其中包含了 MKT 市场因子,HML 价值

因子,与 SMB 规模因子

- Carhart 四因子模型 (Carhart 1997): 在 Fama-French 三因子模型上加上了动量 MOM 因子。
- Novy-Marx 四因子模型(Novy-Marx 2013): 包含 MKT, HML, MOM 以及 PMU 四个因子, 其中 PMU 所用的财务指标是 Gross Profit-to-Asset, 代表 Profitability 维度
- Fama-French 五因子模型 (Fama and French 2015): Fama 和 French 在其三 因子模型的基础上加入了 CMA 和 RMW 两个因子,分别代表 Investment 和 Profitability 两个维度。
- Hou-Xue-Zhang 四因子模型 (Hou, Xue and Zhang 2015): 包含 MKT, SMB, IVA 以及 ROE。其中 IVA 是 Total assets 的年增长率,代表 Investment 维度
- Stambaugh-Yuan 四因子模型 (Stambaugh and Yuan 2016): 包含 MKT, SMB, MGMT 和 PERF 四个因子。MGMT 和 PERF 分别使用了 6 个和 5 个指标, 代表 Management 以及 Performance 相关的两个 Mispricing 因子。虽然该模型只有四个因子,但它用到的基本面和量价指标多达 12 个。
- Daniel-Hirshleifer-Sun 三因子模型 (Daniel, Hirshleifer and Sun 2018): 在 MKT 的基础上,使用 PEAD 和 FIN 两个指标作为短期和长期行为因子 (Behavioral factors) 的代理指标,构建了三因子模型。该模型由于包括了传统的 MKT 市场因子,又包括行为因子,故称为复合模型。

对于第二个问题,则涉及了不同多因子模型之间的比较。目前学界主要有三种方法:

- GRS tests
- Mean-Variance Spanning tests
- Bayesian approach

【待整理】

GRS tests (Gibbons, Ross 和 Shanken 1989) 检验 n 个资产在给定因子模型下的定价错误 α ,是否在统计上联合为零(jointly equal to zero)。在比较两个多因子模型时,使用两个模型的因子互为资产和定价模型进行检验。

Mean-Variance Spanning tests 考察 n 个已知资产构建的 mean-variance 有效前沿能否包含某个新资产(Huberman 和 Kandel 1987)。在比较两个多因子模型时,使用每个模型的因子构建有

2.5 系统性风险 2 基础

效前沿,并逐一检验其能否包含另一个模型中的因子。

在 Bayesian approach 中,假设比较两个多因子模型 M_1 和 M_2 ,数据集使用 D 表示。令 $P(M_1)$ 和 $P(M_2)$ 为这两个模型的先验概率,且有 $P(M_1) + prob(M_2) = 1$ (这里假设把多个模型 两两比较)。根据贝叶斯定理有:

$$P(M_i \mid D) = \frac{P(M_i)P(D \mid M_i)}{P(M_1)P(D \mid M_1) + P(M_2)P(D \mid M_2)}$$

其中:

$$P(D \mid M_i) = \int_{\theta_i} P(\theta_i) P(D \mid \theta_i) d\theta_i$$

上式中, $P(\theta_i)$ 是模型 i 参数的先验分布, $P(D \mid \theta_i)$ 是模型 i 的似然函数。上述贝叶斯方法的核心在于确定 $P(\theta_i)$ 。根据 Pastor 和 Stambaugh(2000)以及 Barillas 和 Shanken(2018)的理论,它和以两个模型中的全部因子作为资产所构成的投资组合的预期最大夏普率的平方与市场夏普率的比值有关。

2.5 系统性风险

除了市场因子以外的风险都是可以被分散的,所以只要是超过市场组合收益的部分都叫做超额收益。

多因子模型的表达式同样强调,只有那些影响众多资产收益率共同运动的风险,而非资产的特质性风险(即可以通过分散化规避掉的风险),才是预期收益率的来源。

系统风险(Systematic risk)的暴露程度,即对于市场风险暴露的大小。即资产的预期超额收益率,由市场组合(市场因子)的预期超额收益率与该资产对市场风险的暴露大小决定。或可以理解为,单项资产的 β 系数是指资产预期超额收益率与市场组合预期超额收益率之间变动关系的敏感程度。

系统性风险(Systematic risk),又称市场风险或不可分散风险,是影响所有资产的、不能通过资产组合而消除的风险。这部分风险是由那些影响整个市场的风险所引起的,无论怎样分散投资,也不可能消除系统性风险。避免集中投资于单一市场可减少系统性风险。单项资产、证券资产组合或不同公司受系统性风险影响不一样,系统性风险的大小通常用 beta 系数(β 系数)来衡量。

3 方法论

时序回归、截面回归和 Fama-MacBeth 回归

3.1 Fama-MacBeth 回归